

师道师说——全景展示大师的学术生活史

师道师说

中国文化书院九秩导师文集


周一良

卷

名誉主编◎汤一介 主编◎王守常

选编◎周启锐

赵和平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
东方出版社

中国文化书院九秩导师文集

周一良卷

名誉主编◎汤一介 主编◎王守常

选编◎周启锐

赵和平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
东方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师道师说. 周一良卷 / 周一良 著; 周启锐, 赵和平 编. —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13. 1
(中国文化书院九秩导师文集)
ISBN 978-7-5060-5983-1

I. ①师… II. ①周… ②周… ③赵… III. ①周一良 (1913~2001) —文集 IV. ①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310562 号

师道师说: 周一良卷

(SHIDAO SHISHUO: ZHOU YILIANG JUAN)

作 者: 周一良

编 者: 周启锐 赵和平

责任编辑: 姬 利 张 龙

出 版: 东方出版社

发 行: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有限公司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6

印 刷: 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

版 次: 2013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000 册

开 本: 700 毫米×960 毫米 1/16

印 张: 26

字 数: 335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060-5983-1

定 价: 45.00 元

发行电话: (010) 65210056 65210060 65210062 65210063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本书观点并不代表本社立场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拨打电话: (010) 65210012

《中国文化书院导师文集》 编辑出版工作委员会

名誉主编：汤一介
主 编：王守常
副主编：李中华 魏常海

编 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 尧	王守常	方立天	乐黛云	宁 可
刘梦溪	汤一介	孙长江	杜维明	杨 辛
李中华	李学勤	李泽厚	吴良镛	余敦康
张立文	陈越光	林 娅	欧阳中石	庞 朴
侯仁之	谢 龙	戴 逸	魏常海	

组织编辑：中国文化书院

总序一

中国文化书院创办于1984年，是一所在众多老一代著名学者梁漱溟、冯友兰、张岱年、邓广铭、周一良、任继愈等先生的支持下，由一批中青年学者办起来的民间学术文化团体。到今年（2011）已经有二十七年的历史，一个纯民间的学术团体在艰难的情况下，能坚持下来，而且对推动中国学术文化的建设多多少少出了点力，是可以感到欣慰的。

自1949年后，民办的书院在中国大陆逐渐消失了，1984年中国文化书院的建立也可以算是一件新事物。据我所知，如果说中国文化书院不能算1949年后第一个颇有影响的纯民间学术文化团体，大概也是最早办起来的少数几个中的一个了。自中国文化书院建立后，全国各地出现了众多的新办书院，并恢复了多所在历史上有影响的书院。因此，说中国文化书院对民办书院起了个带头作用，大概也不为过吧！

我认为，对中国文化书院来说，也许最为宝贵的是，书院集合了一批有志发展和创新中国文化的老中青三代学者。老一代学者如梁漱溟、冯友兰、张岱年、邓广铭、周一良、任继愈等，他们的学术风范，无疑是当时维系书院的精神力量。1984年底，文化书院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开会，当时我们没有院址，也没有什么经费。任继愈先生说：“草棚大学可以办，我们连草棚都没有也要办。”因此，1985年3月中国文化书院借青年干部学院场地举办了第一期“中国传统文化讲习班”。这次讲习班是梁漱溟先生自1953年后的第一次公开演讲，当时梁先生已经88岁了。我们请他坐着讲，而梁先生一定要站着讲，他说这是一种规范。梁先生在演讲中高声地说：“我是一个拼命干的人，我一生都是拼命干。”这对在场二百多名听众是极大的鼓舞，也给了中国文化书院在风风雨雨艰难的环境中得以支持下去的一种精神力量。

一个希望在中国发生良好作用的学术团体，应该是一个“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开放型群体。中国文化书院在走过的二十多年中虽然存在过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它却是一个能容纳不同学术观点，无门户之见，有良好学术风气的团体。例如在中国文化书院中，对中国传统文化，既有持激进批判态度的青年学者，也有被视为致力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大师，还有努力寻求使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接轨的中坚力量。这些在文化问题上具有不同认识的学者集合在一起，虽然对中国文化发展路向的考虑有所不同，但他们所抱有的一种推动中国文化从传统走向现代、走向世界的愿望则是一致的。在这一时期，中国文化书院也和国内外的许多学术团体和非学术团体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在中国文化书院导师队伍中不仅有众多的我国第一流学者，而且还聘请了一批美国、加拿大、日本、德国、澳大利亚、新加坡以及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地区的著名学者作为导师。

中国文化书院的“宗旨”是：“通过对中国文化的教学和研究，继承和发扬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通过对海外文化的研究、介绍和学术交流，提高对中国文化的研究水平，促进中国文化的现代化。”我们有一个共同的认识：弘扬中国文化在世界走向全球化的时刻要有一个观照全球的眼光，我们一方面要坚持自身文化的主体性，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有吸收和融化其他民族文化的开放性。根据这样的认识，中国文化书院一直在努力使它成为一个更加有主体精神、更加开放、能容纳多元趋向的有朝气的学术团体。

回顾中国文化书院二十多年的历史，在它即将进入“而立”之年时，我们从2010年起开始筹备编辑出版一套已故去的和现仍在世的九十岁以上导师每人一册的“文集”。在这套“文集”中，收入他们有代表性的论文和他们的子女、学生的纪念文章。这套“文集”不仅为了表示对他们的怀念和尊敬，而且它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现代中国文化走过的历程。

在我们编辑的过程中，江力同志出力颇多，东方出版社的同仁给予大力支持，并由东方出版社出版，特此致谢。

汤一介

2011年12月1日

总序二

司马迁在《史记·天官书》中用“三五之变”来讲天运变化，也可以用来比附二十世纪的社会思想文化的变迁。那一百年里，中国社会变迁经历了上下两个五十年社会制度与文化思想的大变革。在第一个五十年的三十年代，中国思想文化经历了从“二千年来未有之变局”的阵痛，走向融合西方思想文化而从容探索建构中国式的思想文化范式的历程，造就中国近现代文化思想史的“黄金时代”。一批颇具哲学思想原创性的著作纷至展现，他们走出王国维的以西方哲学概念诠释中国哲学观念的困局。在历史考古学方面，以西方史学的理论充实了传统中国史学的纪传体叙事模式，以实证田野调查手段，让五千年古史鲜活起来。在文学领域，他们以人文主义融合了传统中国诗词歌赋的情感创造出新时代文学作品。在训诂考据文字学方面，他们用新的研究方法给这最具传统的领域增添绚丽色彩。总而言之，那三十年几乎在所有人文学社会学科都产生了划时代的具有典范意义的学术成果。诚如梁启超所言：“合泰西各国学术思想于一炉而治之，以造成我国特别之新文明。”可以说今天的学人如不能承继这份学术遗产的话，是无法迈进中国学术研究的堂奥。

后五十年代始，中国社会发生了中国史上的巨变，以新中国的成立为标志，结束了中华民族近百年的屈辱史。其后三十年，曾经引导中国思想剧变的马克思主义开始了由学理向意识形态话语的转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更确切地说毛泽东思想笼罩了中国思想文化界。在全球冷战格局中的中国在理论学术界，“左”倾教条主义得以大肆横行，政治批判取代了严肃的学理研究，所有学术话语都转换成意识形态斗争的语言。从而造成学术理论思想创见的贫乏，学术研究的发展由繁荣走向枯

稿。人文社会学科的学术研究除在古籍史料整理上有值得称道的成绩以外，在学术理论、学术方法方面的发展则乏善可陈。待到八十年代，随着经济制度的改革和思想学术研究放开，思想界也开始了对现代化与西方现代化的种种历史成因的文化反思，西方现代学术思想再次如潮涌来，各种西方学术著作译为中文，成为最时尚的读物，演为第二世纪的第二次“西学东渐”高潮。此后又有多年的思想学术的低潮，不过那寂寞春夏还是孕育了学术思想的种子，二十世纪最后十多年学术思想的成果还是有了长足的发展。

二十世纪去了，中国文化书院的一部分导师也随之仙逝。他们大多出生在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近百年来他们用心血写就了二十世纪学术史上最恢宏的篇章，他们的心路历程是二十世纪的生活史中最让人心痛的一页。他们有过愉快，有过迷茫，有过痛苦，但他们矢志不渝地爱着中国。他们用心用笔将世界文化迎进中国，又将中国文化介绍给世界。

这套丛书选编了中国文化书院九十岁以上的导师的最具代表性著作和他们的亲友及学生对先生的追忆而集结成书。不为歌功颂德，只为记住我们自己的老师！当然我也企盼先生生于斯，长于斯的这方土地上，也应有属于他们的一座纪念碑！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是为序。

后学王守常谨记

2011年12月22日深夜

序一 悼念周一良

季羨林

最近两个月来，我接连接到老友逝世的噩耗，内心震动，悲从中来。但是，最出我意料的、最使我哀痛的还是一良兄的远行。

2001年9月16日，中国文化书院在友谊宾馆友谊官为书院导师庆祝90华诞和米寿举行宴会。一良属于米寿的范畴，是寿星老中最年轻的。他虽已乘坐轮椅多年，但在那天的宴会上，虽称不上神采奕奕，却也面色红润，应对自如。我心里想，他还会活上若干年的。就在几天前，在10月20日，任继愈先生宴请香港饶宗颐先生，请一良和我作陪。他因身体不适，未能赴宴，亲笔签了一本书，送给饶先生。饶先生也在自己的画册上签上了名送给他。但在两天后，杨锐想把这一本书送到他家时，他已经离开了人世。多么突然的消息！江淹说：“自古皆有死，莫不饮恨而吞声。”鲁迅先生也说：死大概会有点痛苦的，但一个人一生只能有一次，是会过得去的。但一良是在睡梦中一个人悄没声地走掉的。据老百姓的说法，这是前生修来的。一良的死毫无痛苦，这对我们这些后死者也总算是一种安慰了。

一良小我两岁，在大学时至少应该同学二年的。但是，他当时在燕京读书，我则在清华。我们读的不是一个行当。即使相见，也不会有深交的。可以说，我们俩在大学时期是并不认识的。一直到1946年，我在去国11年之后回到北平，在北大任教，他当时在清华任教。此时我们所从事的研究工作已经有一部分相同了。因为我在德国读梵文，他在美国也学了梵文。既然有了共同语言，订交自是意中事。我曾在翠花胡同寓舍中发起了一个类似读书会一类的组织，邀请研究领域相同或相近的一些青年学者定期聚会，互通信息，讨论一些大家都有兴趣的学术问题，参加者有一良、翁独健等人。开过几次会，大家都认为有所收获。从此以后，一良同我之间的相互了解加深了，友谊增强了，一直到现

在，五十余间并未减退。

一良出自名门世家，家学渊源，年幼时读书条件好到无法再好的水平。因此，他对中国古典文献，特别是史籍，都有很深的造诣。他曾赴日本和美国留学，熟练掌握英日两国语言，兼又天资聪颖，个人勤奋，最终成为一代学人，良有以也。中年后他专治魏晋南北朝史，旁及敦煌遗书、佛教研究，多所创获，巍然大师，海内无出其右者。至于他的学术风格，我可以引汤用彤先生两句话。有一天，汤先生对我说：“周一良的文章，有点像陈寅恪先生。”可见锡予先生对他评价之高。在那一段非常时期，他曾同人合编过一部《世界通史》。这恐怕是一部“应制”之作，并非他之所长。但是统观全书，并不落俗人窠臼，也可见他对史学功底之深厚。可惜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他长才未展。他留下的几部专著，决不能说是已尽其所长，我只能引用唐人诗句：“长使英雄泪满襟”了。

一良虽然自称“毕竟一书生”，但是据我看，即使他是一个书生，也是一个有骨气、有正义感的书生，决不是山东土话所称的“孬种”。在十年浩劫中，他跳出来反对北大那一位倒行逆施、炙手可热的“老佛爷”。当时北大大权全掌握在“老佛爷”手中，一良的命运可想而知。他同我一样，一跳就跳进了“牛棚”，我们成了“棚友”。我们住在棚中时，新北大公社的广播经常鬼哭神嚎地喊出了周一良、侯仁之、季羨林的名字，连成了一串，仿佛我们是三位一体似的。有一次，忘记了是批斗什么人，我们三个都是“陪斗”。我们被赶进了原大饭厅台下的一间小屋里，像达摩老祖一样，面壁而立。我忽然听到几声巴掌打脸或脊梁的声音，清脆“悦”耳，是从周一良和侯仁之身上传过来的。我想，下面该轮到我了。我肃穆恭候，然而巴掌竟没有打过来，我顿时颇有“失望”之感。忽听台上一声狮子吼：“把侯仁之、周一良、季羨林押上来！”我们就各被两个壮汉反剪双臂押上台去，口号声震天动地。这种阵势我经受了多次，已经驾轻就熟，竟不心慌意乱，熟练地自己弯腰低头，坐上了“喷气式”。至于那些野狗狂叫般的批判发言，我却充耳不闻了。这一段十分残酷然而却又十分光荣的回忆，拉近了我同侯仁之

和周一良的关系。

一良是十分爱国的。当年他在美国读书时，曾同另一位也是学历史的中国学者共同受到了胡适之先生的器重。据知情人说，在胡先生心目中，一良的地位超过那一位学者。如果他选择移民的道路，拿一个终身教授，搞一个名利双收，直如探囊取物，唾手可得。然而他却选择了回国的道路，至今已五十余年矣。在这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中，他走过的道路，有时顺顺利利，满地繁花似锦；有时又坎坎坷坷，宛如黑云压城。但无论什么情况，什么境地，他始终无怨无悔地爱着我们这个国家。在这一点上，我虽驽钝，也愿意成为他的“同志”。因此，半个多世纪以来，我们始终维持着可喜的友谊。见面时，握手一谈，双方都感到极大的快慰。然而，一转瞬间，这一切都顿时成了过去。“当时只是寻常”，我在心里不禁又默诵起这一句我非常喜爱的词。回首前尘，已如海上蓬莱三山，可望而不可即了。

我已经年逾九旬。我在任何方面都是一个胸无大志的人，包括年龄在内，能活到这样高的年龄，极出我意料和计划。世人都认为长寿是福。我也不敢否认。但是，看到比自己年轻的老友一个个先我离去。他们成了被哀悼者，我却成了哀悼者。被哀悼者对哀悼这种事情大概是不知不觉的。我这哀悼者却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七情六欲，件件不缺。而我又偏偏是一个极重感情的人，我内心的悲哀实在不足为外人道也。鲁迅笔下那一个小女孩看到的开满了野百合花的地方，是人人都必须到的，问题只在先后。按中国序齿的办法，我在北大教授中虽然还没有达到前三甲的水平，但早已排到了前列。到那个地方去，我是持有优待证的。那个地方早已洒扫庭除，等待我的光临了。我已下定决心，决不抢先使用优待证。但是这种事情能由我自己来决定吗？我想什么都是没有用的，我索性不再去想它。停笔凝望窗外，不久前还是绿盖擎天的荷塘，现在已经是一片惨黄。我想套用英国诗人雪莱的两句诗：“如果秋天到了，冬天还会远吗？”闭目凝思，若有所思。

2001年10月26日

（原载《敦煌吐鲁番研究》第6卷，2002年10月）

序二 悼念周一良先生

汤一介

照中国文化书院的惯例，我们的导师 80 岁、85 岁、88 岁（即米寿）和 90 岁以上时，总要为他们开一个盛大的祝寿会。今年（2001 年）正好是周一良先生的“米寿”，中国文化书院于 9 月 16 日在友谊宾馆的聚福园举办周先生的祝寿宴。周先生患帕金森氏病已多年，我们原估计他不一定能来参加宴会，先期给他送去了蛋糕和鲜花，表示大家对他的衷心祝贺。想不到那天周先生竟坐在轮椅上，由他的三儿和儿媳陪同，艰难地前来了，足见他对相处十数年的书院老友的眷念和对书院的情谊之深。

周先生的不期而至，使我们的宴会厅顿时欢腾起来。可惜他刚刚拔牙，什么也不能吃，我们特别让厨师为他做了一些稀饭，由他儿媳一口一口喂他。书院各位导师和来宾都前来向周先生祝寿，愿他早日康复。宴会长达两小时，周先生一直等到宴会结束才离去。

9 月 18 日，我离开北京前往美国斯坦福大学，本想临行前再去看看周先生，但诸事丛集，终于未能成行。10 月 23 日，突然接到范达人同志从洛杉矶打来的电话，说一良先生已于当日凌晨与世长辞。第二天，又接到我女儿从新泽西来电，告诉我周先生病逝。这对我来说确实十分意外。记得今年 7 月我去看周先生时，他还坐在椅子上，一边从电视中看清华校庆盛况，一边吃着炸土豆片，并让我也吃。看来他精神很不错，还神采奕奕地谈起他的写作计划。现在，周先生离开了我们，想起来，我没有在临行前去看他，已成为我一生中难于弥补的一大憾事。

我和周先生的交往并不太多，作为中国文化书院的院长，往往在每年春节前后会去看看他，只能说是一种礼节性的拜访。有时也会去向他请教一些学术上的问题，他总是细心地加以指导或者让我去查看什么书。我虽然没有上过周先生的课，但他的著作我是用心读的。他对我所

提的问题的指导，我也一向十分重视。因此，就这个意义上说，周先生可以说是我的老师。在我和周先生的交往中，有几件事对我的影响非常大。第一件事是他写了那本自传性的《毕竟是书生》。这本书他先给我看了初稿，征求我的意见。我曾提到“梁效”那一部分也许会引起不同的议论。他说：“我也只能这样写了。事实上，我没有什么要求于江青，而是江青有求于我呀！”他又说：“这段历史是我们这样的书生搞不清的。”后来，《毕竟是书生》出版，虽然有一些好评，但也有一些恶评，他都泰然处之。有一次，又谈到这本书，他说：“有些话是我没有说出的。”我问他是什么话，他说，“这本书题为‘毕竟是书生’没有说全，似乎应题为‘毕竟是书生，书生上了当’，我们自责是应该的，但历史还是历史。”到底周先生是一位杰出的历史学家。

第二件事是在一良夫人去世之后，我去看他，表示慰问。周先生对我说，他已和邓懿一起生活了几十年，相依为命，现在，邓懿先走了，形单影只，心灵的寂寞只好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了！我听了，心里也十分惨然。他还告诉我，他正在写他和邓懿一起生活的回忆录。又说，“这几十年我们能这样地相互支持和了解，也是人生中的一大欣慰了。”再一次我去时，他告诉我那本回忆录已经完成，但要再加加工，因此也没有给我看。后来，为出季羨林先生90华诞论文集，我请他为论文集写个序，在序中他又一次提到几十年来他和邓懿生活在一起是他一生最大的幸运。周先生无疑是一位难得的、有真情的老学者，在这方面亦可成为后人的楷模。在那痛苦的20世纪后半叶的非常时期，得一始终相互理解而相爱的生活旅伴，在人生道路上，也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啊。

第三件事是我写了一篇题为《“和而不同”的价值资源》的文章，曾在庆祝北京大学一百周年校庆的学术讨论会上宣读。该文是要说明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是文化发展的动力。文章除引用了《左传》中晏婴对齐侯的一段话和《国语·郑语》史伯答桓公的一段话外，还引用了孔子说的“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周先生看了这篇文章后对我说：“你的那篇文章立意很好，引用《左传》、《国语》两段很切题。

但孔子的话是否解释得合乎原意，可以再研究，我看多做一点说明更好。”后来我查了各种对孔子“和而不同”的解释，觉得周先生提得很有道理，我应该多做点说明，并且强调这是借用而作的一种新解。就此，我深深体会到周先生做学问之严谨，是我应该好好学习的。说到周一良先生的学问，无论他的同辈或我们这些晚辈都是十分佩服的。读他的书文，甚至札记，都会感到他学问的渊博和严谨。他关于魏晋南北朝的研究，几乎可以说每一论断都可成为定论或给人们指出了可以继续研究的方面。我读他的第一篇文章《能仁与仁祠》，就被他的精细考证与合理说明所折服，再读他的《读十一史札记》，条条都有启发。无怪乎学界都认为一良先生是研究魏晋南北朝历史的大师，寅恪先生的最有成就的后继者。

周一良先生的去世是中国学术界的一大损失，中国文化书院又失去了一位极可尊敬的导师。

2001年10月24日于美国加州

(原载《群言》2002年第3期)

周一良教授传略

赵和平

周一良，字太初，安徽东至人，1913年1月19日出生于山东青岛，2001年10月23日逝世于北京，享年88岁。

周一良原籍安徽省建德县，建德周氏是近现代我国有名的大家族之一。曾祖父周馥（1837—1921）字玉山，由李鸿章的幕府起家，官至两江、两广总督，《清史稿》有传。祖父周学海（1856—1906）字澄之，光绪十八年壬辰（1892）进士，授内阁中书，官至浙江候补道，心不在仕途而性喜医学，校订刊刻《周氏医学丛书》，《清史稿》入《艺术传》。父亲周叔弢（1891—1984）原名暹，后以字行，是现代实业家，“南张（謇）北周（学熙）”之“北周”系统的重要代表人物，著名的藏书家。弢翁严于律己，思想与时俱进，新中国成立后任天津市副市长，去世前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周一良先生即为弢翁长子，自幼即生活在具有深厚文化氛围的大家庭中。

周先生八岁入塾（时已迁居天津），其课业与一般私塾不同，弢翁亲自制定仿汉代课业，即从《孝经》、《论语》启蒙，继之以《孟子》、《诗经》、《礼记》、《尚书》、《左传》等经及《古文辞类纂》、《史记》、《说文》、《资治通鉴》等，且按字体的发展顺序小篆、隶书、楷书习书法。所延塾师皆为有真才实学之名士，如张恂、毓廉、温肃、唐兰等。自1924年起，随日本家庭教师习日文四年，自1928年起，从英国家庭教师习英文三年。十年家馆，不仅具备了深厚的国学功底，而且打下了坚实的外文基础。

1930年赴北平求学，先入燕京大学国文专修科，唐兰先生给当时在燕京大学任教的容庚先生信中说：“其人少年，学有根底”。1932年秋，插入燕京大学历史系二年级，一代史学大家邓之诚、洪业、陈寅恪等，先后对周一良的治学产生过深刻影响。1935年毕业，毕业论文为

《〈大日本史〉之史学》，之后入研究院肄业，次年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南京），在历史组长陈寅恪先生指导下，专攻魏晋南北朝史。

1939年秋，由燕京大学哈佛燕京学社奖学金资助入哈佛大学远东语言系（后改称东亚语言及文化系），从叶理绥（Serge Elisseeff，日名英利世夫，西方日本学的奠基人）习日本语言文学，并从柯拉克（Waltre Clark）习梵文，同时修习法、德等多种外语。1944年，以《唐代印度来华密宗三僧考》（Tantrism in China）通过论文答辩，获哲学博士学位，同年起任哈佛大学日语教师。

抗战胜利后，1946年起返国任燕京大学国文系副教授，次年秋任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1949年转任历史系教授，1951—1952年兼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1952年院系调整，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先后兼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主任、亚洲史（后改亚非史）教研室主任、副系主任、系主任。历年在各校所授课程有：日文、佛教翻译文学、中国通史、魏晋南北朝史、日本史、亚洲史、历史文选等。

系统严格的家塾训练，开明而传统的家庭影响，完整严谨的现代高等教育，中外名师的教诲和熏陶，加之天资与勤奋，使之具备了治学的坚实基础及远见卓识。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迄辞世，在中国史、日本史、亚洲史、佛学、敦煌学、中外关系及中外文化交流史等领域都取得了丰硕成果，其中的大部分论著代表了这一领域的最高水平，有的则开风气之先。

自上世纪五十年代起，周先生先后到法国、荷兰、摩洛哥、巴基斯坦、加纳、埃塞俄比亚、日本、韩国、美国等国讲学、访问、参加国际学术会议或发表演讲等，是蜚声海内外的著名历史学家。

1934年在《燕京学报》第18期发表首篇学术论文《魏收之史学》开始，周先生在魏晋南北朝史和中国史上着力最多。已出版了《魏晋南北朝史论集》（中华书局，1963年），《魏晋南北朝史札记》（中华书局，1985年3月，至今已重印多次）等专著。周先生的著作，既有沿袭朴学传统的字词、名物的考证、考据，又有运用现代史学理论，高屋

建瓴的宏观论述，宏观与微观研究的结合，使他成为与唐长孺、何兹全、缪钺诸先生齐名的魏晋南北朝史领域的大家。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周先生担任《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卷》魏晋南北朝史一段的主编，并参与撰写“南朝”等条目。孙毓棠先生去世后，又接替孙先生担任《中国历史卷》（三卷）的常务副主编，而主编侯外庐先生长期卧病，后期的协调、组织、审阅、决策等工作由周先生在编辑部的协助下完成。《中国历史卷》全书430万字，是40年来中国史研究成果的总检阅，也是第一部以中国历史为对象的百科全书。此书顺利刊出并受到学术界的推许，肯定了他在中国史研究领域的地位。

日本语言文学历史的研究是周先生毕生用力的另一个领域，1934年，还是学生的他就发表了《日本内藤湖南先生在中国史学上之贡献》，1935年毕业论文为《〈大日本史〉之史学》，这两篇论文是我国研究内藤湖南、《大日本史》的开山之作。周先生在哈佛期间主修日本语言文学，在童子功的基础上，又得叶理绥亲炙，自1943年起即在哈佛、燕京、清华、北大等校开设日文及日本史课程。1952年院系调整后，在北大即讲授日本史和亚洲史，并撰写了多篇有关日本、朝鲜及亚洲的学术论文。1958年出版《亚洲各国史》。上世纪90年代初，周先生对新井白石进行研究，并将《折焚柴记》译成中文；周先生与夫人邓懿合作，将美国学者霍尔（John Whitney Hall）著《日本》译成中文，给中国学术界了解西方日本史研究打开了一扇窗口。

作为中国日本史研究领域与吴廷璆、邹有恒齐名的“三老”之一，周先生培养了一批如夏应元、沈仁安、周启乾、汤重南、王晓秋等日本研究的专家。1997年2月19日，日本大阪隆重举行了第十五届山片蟠桃日本研究大奖颁奖仪式，周一良是获此大奖的第一名中国学者。

由日本史而亚洲史，由亚洲史而世界史，是合乎逻辑的发展。周一良和吴于廑主编的《世界通史》（四卷本，人民出版社1962年初版，后又多次重版），是我国的第一部世界通史，培养和影响了一代学者。

佛教与佛学研究是周先生毕生用力最勤的又一学术领域，他的哈佛博士毕业论文即为《Tantrism in China》，此文至今仍然是研究密宗的必